

◀ (上接11版)

亲参加岭大一个赴京小组，调查了解京城高校教学（教材）有关问题。先父走后先母与先祖母发生严重口角，颇有不可开交之势（这应该是婆媳之间难以避免的家务琐事），住在附近的冯伯伯，几次过来规劝，使我家婆媳口角平息。那时笔者年纪尚小，但冯伯伯关心我家的情景至今未忘。先父返穗后，曾向家人表示，幸得老同学的帮助。

分隔两地仍联系不断，友谊甚笃

1952年秋广州高校院系调整，冯伯伯被调去筹建新的院校——华南工学院。石牌华工与中大康乐园相距近20公里，冯伯伯一个星期才回康乐园两天，平时两人又各忙各的，难得有相见的机会。他俩的交往随之大为减少，不过仍未中断，却更显真挚。

先父从1957年开始有在案历上记事的习惯（当然并非每天记，其中，1960年便缺记）。现查看其《案头日历记事》，和冯伯伯交往的有这样几则：

(1957年)11月24日 下午与秉铨夫妇在南方大厦吃饭

(1958年)2月23日 全家照像

(1961年)1月30日 冯秉铨夫妇来

(1964年)2月16日 秉铨来谈至晚十时许始去

2月19日 给高兆兰母亲拜年，留谈一小时许

(1966年)1月26日 秉铨来访

以上其中两条；57、58年记事甚值书写。

反右鸣放时，冯伯伯因一句“运动之风何时去，学术之风何时来”（其实此话最先并非出自其口），当时被某些人斥之为典型的右派言论，欲加之罪。后来，冯伯伯虽逃过戴“右派”帽子之劫，却仍被划为“内定右派”，处境甚受影响。先父虽知道此事，却从未与冯伯伯疏远，反而在反右运动高潮（接近结尾）时的1957年11月请冯伯伯夫妇于南方大厦用膳。

1958年，冯伯伯夫妇在我家聚会后，大家拍照留念。据冯高义分析，当时相机是冯家的，手执相机者分别是冯伯伯和冯伯母。从这些事可看出，特殊历史情况下我们两家的亲近关系和互勉共渡时艰的具体场景，甚堪留念作证。



史学研究会同仁，左二为梁方仲，左四为罗尔纲，左五为张荫麟，左六为吴晗，左八为汤象龙



陈寅恪和王力(右)，1949年摄于岭南大学九家村“仰光屋”陈寅恪寓所前

“生前死后皆同学”

环顾历史，冯伯伯与先父之交往，可用“生前死后皆同学”一话来形容。1978年7月29日中山大学在中大大礼堂为先父等18人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冯伯伯从石牌赶来参加，他特意来到笔者面前，脸色沉重但亲切地要我们节哀并嘱咐要照料好家庭。生前同学痛悼逝去同窗挚友的情景，笔者感动不已，至今难忘。

或许有一事应该特别一提。历史后来把这两位清华同学在一个十分庄重的场合再次“召集”到一起，展现了“生前死后皆

同学”之动人一幕。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在该校“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电视台”的“清华人物栏”中，他俩又“相聚”在母校。该栏列出（介绍）的清华人物共20位，代表了百年清华各领域的杰出人士。这20位分别是：朱光亚、冯秉铨、华罗庚、彭桓武、邓稼先、侯德榜、赵萝蕤、钱锺书、陈寅恪、范敬宜、吴阶平、冯友兰、季羨林、钱三强、梁方仲、朱自清、梁启超、梁思成、俞平伯、王明贞。

在20位校友的介绍中，对他们俩的介绍分别是：

梁方仲：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奠基 当经济史学界一窝蜂地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不休时，他却相信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必须从整理基本的资料，尤其是基本的数据开始，进而



1958年在梁方仲家聚会后的留影，中间为梁方仲母亲，右为梁方仲，后排左一为高兆兰



冯秉铨、高兆兰夫妇合影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在“清华人物栏”介绍的20位百年来清华各领域杰出人士

把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花在了当时没有任何人重视的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去，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计量化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冯秉铨：愿得英才三千数 春蚕丝尽方长眠 他少年得志，被视作哈佛的学术新星，却选择孔雀东南飞，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当个“穷教书匠”；他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却从未向

人抱怨，还以“老牛不怕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为座右铭；他的振荡理论本可发展出更多的可能性，但为了培养学生，他却自愿搁置自己的科研工作……

两位先人已经作古，但他们的母校——清华，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的后人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生前死后皆同学”的情谊将渊源流芳。